

新时代山乡巨变中女性的担当与回响

——读董艳菊长篇小说《女人是歌》

曹景常

作家董艳菊的长篇小说《女人是歌》以东北乡村为背景，透过林凤鸣(豆苗)的生命轨迹，编织出一幅改革开放初期女性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勇敢探索与成长的壮阔画卷。

小说通过一个女性个体的命运成长与乡土社会变革的互相影响及映射，展现了传统性别秩序中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轨迹，其叙事深度不仅在于记录历史，更在于揭示了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人”的解放命题。因此说，这部作品不仅是个体命运的史诗，更折射出时代转型中乡村的阵痛与新生，字里行间流淌着对女性生命力的礼赞，以及对乡土中国变革的深刻洞察；同时，也以生动的笔触，体现了新时代山乡巨变中女性的担当与回响。

小说开篇以闲笔的方式交待了主人公的名字变迁，这一处交待看似漫不经心，但就是在举重若轻的叙述中，折射出主人公内心的变迁与自我意识觉醒。顾名思义，“豆苗”是乡土社会赋予她的标签——柔弱、依附，如同田间随风摇摆的幼苗；而“林凤鸣”则是她为自己选择的身份，以“凤凰”高鸣的意象宣告对命运的掌控，也代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当初的豆苗，作为郭家媳妇，面对贫困的家境，压抑的婆媳关系与丈夫的愚孝，最初的反抗带着朴素的生存诉求：“一天能吃上一顿细粮，夏天能住上带玻璃窗户的大瓦房。”为了分家与当家权，她不惜以“假离婚”相逼，却在丈夫的耳光与婆家的对峙中，意外将“假戏”演成

“真做”。这场冲突，撕开了传统婚姻的温情面纱，也让她第一次意识到：生命尊严的取得和幸福生活的争取，只能靠自己努力。

林凤鸣的致富之路，本质上是乡土社会与市场化社会变革之间磨合与衔接的过程。从“种玉米、水稻”的自给自足，到“种黑木耳、搞运输”的商品生产，林凤鸣的每一步探索都伴随着与传统伦理的博弈。当她提出“用砖票换粮食”的商业构想时，遭遇的不仅是婆家的质疑，更是村民“不守本分”的指责——在乡土的传统逻辑中，“算计”与“情义”天然对立。而她最终以“先付定金、统一价格”的规则化解危机，实则是用市场契约精神重构了乡村的信用体系。

黑木耳种植的情节促成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林凤鸣既遵循“木头杆搭架”的乡土经验，又引入“高温消毒、菌种接种”的现代农业技术；既依赖“妇女互助”的传统协作模式，又建立“按劳付酬”的现代管理机制。这种融合打破了“现代化即抛弃传统”的迷思——她种黑木耳时“起早贪黑地接种菌种，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遭遇风灾雹灾时“望着眼前的一切，似乎感到了灭顶之灾”，却在废墟中发现“扔到山上的菌袋都长出了木耳芽”。这些细节不仅展现了创业的艰辛，更隐喻着乡土社会在变革中的韧性——传统经验与现代技术的结合，方能在困境中寻得生机。

作者还以细腻笔触刻画了林凤鸣的成长细节：从为孩子断奶与婆婆争执，到借款买拖拉机时的果敢；



从种黑木耳时的技术钻研，到面对工商稽查时的据理力争。每一次困境，都成为她打破固有认知的契机，最终从“家长里短的操持者”成长为“带领全村致富的带头人”。这种成长并非脱离乡土的“飞离”，而是扎根土地的“重生”——她始终带着婆家的老弱病残一起前行，将个人命运与家族、村庄的命运紧密相连，从而成为山乡巨变的主导者和引领者。

小说的叙事空间——东北大农村，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乡村的缩影。在这里，传统伦理与现代观念的碰撞无处不在，构成了林凤鸣成长的时代底色。

家庭结构的变迁是最直观的体现。以郭家为代表的传统大家庭，

“炕上瘫着一个奶奶婆，家里有个瘸腿的小叔子，还有一个哑巴小姑子”，依靠“婆婆当家”的父权逻辑维系。林凤鸣提出分家时遭遇的激烈反抗，本质上是对“孝道至上”“长幼有序”等传统秩序的挑战。而她最终以“民主集中”的方式治家，让“玉英、玉杰收拾碗筷”“保军参与决策”，实则是对传统家庭权力结构的现代性改造。

经济模式的转型更具时代特征。从“种玉米、水稻”的传统农耕，到“种黑木耳、买拖拉机、建食品厂”的多元经营……林凤鸣的脚步始终紧扣时代脉搏，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自觉还是不自觉，她都在实现自己梦想的同时，影响和改变着家乡的面貌。

《女人是歌》，但女人到底是首什么样的歌？

《女人是歌》这一贯穿小说始终的诗情与意象，在不断推进的叙事主体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从开篇“苍凉雄浑”的山歌，到林凤鸣自创的“走向希望”的歌谣，“歌”的变奏恰是女性生命美学的重构过程——从被书写的“客体”，成为自我书写的“主体”。

《女人是歌》，在开篇即埋下伏笔：“太阳出来了，出来了，女人该歇了，该歇了，女人歇不得，歇不得，她背上有小孩呢！”这首山歌既是女性命运的枷锁，也是生命力的咏叹。林凤鸣的生命轨迹，恰是这首歌的变奏——从被动的“歇不得”，到主动的“停不下”，最终将命运的曲调改写为自己的旋律。

她的“歌”里有苦难的底色：为

了供弟弟上学辍学、因挑水流产、被工商稽查没收粮食时吐血；但更多的是坚韧的高音：“就算上刀山、下火海、滚油锅，我林凤鸣也不会再眨一下眼睛。”作者以“凤凰”“木耳”“红松木棺材”等意象，将女性的生命韧性具象化——凤凰浴火重生，木耳在朽木上生长，红松木棺材则暗含着对传统丧葬观念的突破与对生命尊严的坚守。

最终，林凤鸣的“歌”超越了个体范畴，成为乡土中国现代化的集体咏叹。当她站在承包的荒山前，畅想“栽上松树和核桃树”时，这个场景极具象征意义——当代女性命运的自我主宰，从来不是单纯的突围与破局，而是与乡土的振兴、时代的进步同频共振的过程。

作家董艳菊，是一名从乡村走出来的新时代的奋斗者，也是乡村变革中的见证者，正是多年扎实的乡土经验，再加上细腻的女性视角，让《女人是歌》超越了个人奋斗史的范畴，成为一部书写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史诗。

从新时代山乡巨变的角度看，《女人是歌》这部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了一个女性的成长，更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乡土中国的变革，从来不是政策条文的简单落地，而是无数个“林凤鸣”在生存与理想、传统与现代、个人与集体的撕扯中，用血肉之躯蹚出来的道路。她们的歌声或许沙哑，却每一个音符都是那么铿锵有力，都是那么激越动人，成为新时代最动人最具担当力量的激越回响。

穿越新民大街 (组诗)

张藩

纪年

十四年浴血奋战

弹痕勒进裸露的沙石，

每个结痂的伤痛里

站立着未曾倒下的日历

1945年9月

所有迎风起舞的松柏

业已学会

用风霜计数光明

无数蚯蚓不舍昼夜——

它丈量不尽

每块路基底下

隐藏小草的呼吸

绿波

推土机掀开陈旧的混凝土

新增4.5公顷绿波润染街路

十三处口袋公园盛满鸟鸣

樟子松的瞳孔里

涌动蔚蓝的天空

磁场

滑板鞋底蹦溅的火星

焕发旧梦的走廊

古筝弦拨动建筑的哲理

琉璃瓦檐讲述昨天的故事

历史文化博物馆的墙壁上

一株爬山虎正用新叶

擦拭烈士的名字

八十年，胜利的号角

傲骨铮铮

朝阳

一千四百四十五米

被时光反复打磨

减去岁月烽火硝烟

等于所有晨跑者

胸中蓄满的

朝阳

长在乡野的打碗花

闫英学

在乡村的田间地头，草滩上、篱笆旁，有一种朴实无华的野生植物，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打碗花。在盛夏时节，它们灿然开放，仿若在乡间挂起一串串色彩斑斓的“灯笼”，为乡村增添许多迷人的色彩。每当这个时候，打碗花就会在我心中绽放出耀眼的色彩和独特的光华。

打碗花的茎蔓柔韧而细长，像是大自然随意挥洒的线条，沿着篱笆、墙角，肆意攀爬。打碗花的叶子呈心形，边缘微微泛着锯齿，像是大自然用最质朴的剪刀裁剪出来的。而那些花朵，更是毫不起眼，小小的，粉粉的，花瓣薄如蝉翼，仿佛轻轻一碰就会碎掉。它们三三两两地簇拥在一起，像是在窃窃私语，又像是在向过往的行人展示着它们小小的倔强。

小时候，我常常和村里的小伙伴在田野里奔跑嬉戏，打碗花就在我们的脚下、身旁静静地生长。母亲时常告诫我们：“开在田野的打碗花虽然好看，但千万不要碰它，碰了回家吃饭就会打碎碗。”我问母亲，“这是谁说的？”母亲严肃地说：“是你姥姥说的，我小时候没少听你姥姥和我说过。”

我带着这样的疑问，对打碗花既好奇又畏惧。但童年的好奇心总是难以抑制，我们会在离它

不太远的地方蹲下，小心翼翼地观察它，生怕碰到它回家吃饭打碎碗。只见那粉嫩的花朵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像是一个个害羞的小姑娘，可爱极了，又像是在向我们展示着它们独特的美丽。

有一次，我和小伙伴挖野菜时不小心碰到了打碗花，心中满是忐忑，真害怕自己吃饭的那只碗被打碎。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饭碗依旧安稳地待在那里。从此之后，我对打碗花的畏惧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淡淡的喜爱。

打碗花的生命力极为顽强。它生长在田野里，荒滩上，或是栅栏外边，从来不需要人们的精心呵护和照顾，更不需要肥沃的土壤，只要有阳光和雨露就能生长。在炎热的夏日里，它顶着烈日，依旧开得娇艳；在风雨交加的天气里，它的茎蔓虽然被吹得东倒西歪，花

朵却依然倔强地挺立着。它仿佛在自己的方式告诉人们，即使身处困境，也要坚强地生活下去。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地懂事了。再看到打碗花时，总会想起那些在乡村辛勤耕耘的父老乡亲。他们跟打碗花多么相像啊，默默无闻，用自己顽强的生命力，创造生活，创造幸福。他们用自己勤劳善良的双手，在这片土地上播下希望，用汗水浇灌出丰收的果实。

如今，我早已离开了乡下那片土地，在繁华的城市里生活。但在城市的喧嚣面前，我常常想起乡下的那一片片、一朵朵静静开着的打碗花。

打碗花，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没有玫瑰的浓郁芬芳，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它用它的平凡，诠释着生命的顽强与美好。

